

用作品回应三个经典问题

——2021年长篇小说一瞥

刘宇

如何书写革命史与革命者，如何书写“普通人”以及如何创作精彩故事，是三个源远流长的文学问题，2021年的长篇小说给出了不同程度的回答。

如何塑造革命者形象？

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，在这一重要时间节点，涌现出一批描写百年历史的主题性作品。朱秀海《远去的白马》、余之《生死叠加》、老藤《北地》、黄孝阳与陶林合著《队伍》、铁流《靠山》、温燕霞《虎狼》、龙先平《觉醒年代》、郑欣《百川东到海》、兰晓龙《冬与卿》等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。

中国文学素有“文以载道”的传统，“五四”新文学更是从诞生之日起，就承载了参与国家大事、介入社会现实的天赋使命。在革命、建设、改革的不同社会阶段，文学都发挥着重要作用。然而，如何处理宏大历史书写与文学审美原则之间的关系，一直是作家不容回避的问题。幸运的是，近几年，尤其是2021年的长篇小说创作，随着一批有突破性的新型革命者形象的集中出现，让人看到了处理好这一关系的可能性。《远去的白马》就是一部这样的作品。它写的是“千千万万当年为胜利付出了牺牲的代价”的人，却有着同题材作品罕见的浪漫与含蓄。主人公赵秀英为了战争胜利放弃了爱情、家庭，小说理清了对那一代人而言，“大我”和“小我”为何浑然一体，为亲人复仇、追求安稳的生活和国家民族层面的革命事业为何高度统一。革命者的行为与意志以令人能够理解、共情的方式出现在了文学叙事中。

余之言将“先锋”与“主旋律”结合，用“编密码”的叙事形式写下《生死叠加》。小说中特情人员余元谋、王小娇、彭毅将密码破译视为生命，在成就伟大的同时也承受了外人难以体会的艰辛、孤独、残酷。作品塑造了隐形战线、密码战场上多个少见而独特的敌对人物、赤诚战士，从全新角度赋予编密码师、破译师以奇崛的文学形象，实现了密码破译职业行为、使命特性与文学性表达的深度融合。

老藤的《北地》用儿子重走父亲人生路的方式结构全篇。父亲留下的吃语让儿子费解，解谜之路上逐渐清晰的是父亲常克勤的人生，更是那个远去的火热年代。

这些革命者形象，让人想起上世纪60年代，柳青的《创业史》因塑造了梁生宝这一“新人”形象而广受赞誉，但同时也引发了梁生宝和梁三老汉，哪个形象塑造得更成功的讨论。这个经典的文学史问题在今天看来，并不只关乎真伪，更意味着文学应如何先现实一步，找到理解历史、通向未来路径的能力。革命历史与文学创作，并不只是后者表现前者的关系，前者更给予后者丰厚的灵感源泉。

“普通人”怎么写？

在中国古典小说中，帝王将相、神佛妖魔、江湖儿女、才子佳人是作家笔下的“常客”。身为“普通人”，读者乐得旁观“不普通”者的逸闻轶事，在虚拟的投射关系中获得审美愉悦。随着现代文学观念的建立，文学如何处理“普通人”的生活，该给读者带来怎样的影响，成为经典的创作问题。2021年，刘震云《一日三秋》、魏思孝《王能好》、黎紫书《流俗地》、刘庆邦《堂叔堂》、陈集益《金塘河》等作品，无不展现普通人生命的沉重与漫长，但仔细分析，它们在坚实的生活质地中，不乏暖暖温情与真诚的生活态度。

刘震云擅写“没缘分，转眼分离。赤条条，来去无牵挂”的孤寂，《一日三秋》主人公明亮的成长史，也同样如此。小说里前世今生的因素相当动人，在延津人梦中出现、孤寂千年的花二娘亦可圈可点。最后，明亮历尽沧桑，抚平了内心的裂痕，花二娘也某种程度上与命运达成和解，小说总体上是“回首向来萧瑟处，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人物对命运的接受中蕴含着进取心态，孤寂的氛围中也有淡然的心境。“普通人”的命运带给读者共情、抚慰，就是文学面对时代应有的姿态。

魏思孝近些年的创作令人印象深刻，他观察生活的独到眼光、厚重的民间情怀、若隐若现的社会学视野，让他的创作在青年作家中脱颖而出

出。《王能好》用不无荒诞、幽默的语言，在家长里短、红白喜事中描写着乡村世界中的男女老少。在这个城市叙事逐渐占据文坛主流的时代，他脑海中那些即将谢幕的乡村人事奔涌、翻腾着，以至于他的长篇小说总有远超一部作品的内容含量，每个配角都可以单独成书。黎紫书的《流俗地》也是这样的写法，这部作品的扎实厚重在近年难得一见，以盲女银霞的命运为经，以听觉、嗅觉、触觉相融合的叙事为纬，我们看见了锡都怡保的众生相，也看到了流俗如何不俗。银霞在不幸的人生中有令人叹服的柔和、淡然，以此为例，2021年的现实题材长篇小说也表现了人生中的困苦，但与其说是否定人生、批判社会，更多是对人生本相的呈现，对走过这漫漫长路的你我、众生心怀的敬意。

除此之外，2021年也有一些调性相对轻快的现实题材作品值得关注，如王蒙的《猴儿与少年》借学者施炳炎往事，传达作者对现实、社会、人生的深刻认识；陈彦的《喜剧》借五角贺加贝啼笑皆非的人生，讨论喜剧的意义和未来、艺人的选择与浮沉；林白的《北流》用志、词典、注、疏、笺、异辞等形式，书写广西生活史；张柠的《春山谣》以知青下乡为背景，写出了特殊年代里人性和世事不无幽默的嬗变；石一枫的《漂洋过海来送你》用一桩错拿骨灰盒的奇事，展现了新老两代北京人的精神气质；方磊的《世道》则借一个专门收容社会边缘人的“脏老太”形象，表达了面对生活，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豁达态度。

我们今天还需要好故事吗？

小说，尤其是长篇小说，到底应该把“讲故事”放在什么位置？好的故事又从哪来？受现代主义、后现代主义思潮影响，糅合着因文学专业化、小众化产生的精英意识以及对影视剧叙事艺术的距离感，不少作家并不热衷讲故事，更对“好故事”的小说充满戒心。但平心而论，相比形式探索，写出真正精彩的故事并不容易，而且这种追求也并不过时。

马伯庸《长安的荔枝》就讲了一个精彩纷呈又不落俗套的故事。没有机械运力的唐代，将新鲜荔枝从岭南送到长安近似“不可能的任务”。作者将史书记载的唐代政治体制、行政区划、海陆交通、社会生活都变成了情节前进的框架，在不断“加速”的叙事中，让读者酣畅淋漓地看着“不可能”如何“可能”。那些曾经耸人听闻、如今化作历史尘埃的人和事，其实对每一个寻找故事的作家都敞怀怀抱，马伯庸多年来勤勉、巧妙的创作就是证据。王松《飞花调》也是2021年长篇小说中的一抹亮色，如果说马伯庸常从“正史”入手，王松则是天津民间生活、江湖史的专家。这部专写“调门儿”（骗子群体）的作品，展示了民国时期江湖行业的秘密，小说中大量的俚语、切口，以及类似“粘糖人儿”“千年棺材对口儿菌”等只在江湖口口相传的绝活、秘闻被作者记录下来，小说有了地域感，以刑事案件开篇，海飞《江南役》、余之《生死叠加》从谍战角度展开，鲁敏《金色河流》写民营企业家和“金钱观”变化，秦北《归客》写芯片制造业风云变换……这些长篇小说集中展示了历史或行业史中蕴藏的丰富故事，这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，更为今后的小说创作揭示了方法与路径。

文学的变化通常并不以“年”为单位，但2021年是特别的一年。前不久闭幕的中国作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，“新时代文学”概念得到了系统阐释，其背后是近些年的文学创作正在生成有别于过去的质地。对老问题的回答，是进入新阶段的象征，当我们视角拉远，眺望未来，也许就会发现，从2021年开始，文学史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。

（作者系中国作协创研部助理研究员，辽宁作协特聘签约作家）

回响 2021

书衣文录中赤子

汪惠仁

说，自己老了，从中年说到晚年。刘禹锡酬白乐天咏老，首尾皆传世佳句，“人谁不顾老，老去有谁怜”“莫道桑榆晚，为霞尚满天”。始于哀伤，止于振作，这可能适用于多数人的心理需求，却不适用于孙犁。孙犁之叹老，别有所指。这是属于孙犁的时间自治，他有能力让有所不为的晚境提前到来。在长达60余年的写作生涯中，孙犁的生活经历了太多的大变化，有所不为的孙犁，通过时间自治，让晚境另有所为，让晚境别具只眼。

时间自治，在写作者那里得以实现，扎实的现实的也许是最终的途径是语言自治。孙犁是一个有能力呈现语言自治的作家——在现当代作家中，这样的人并不多。书衣文录中大量的段落是关于读书的——藏书，爱书，最重要的，他真读书。在天津市和平区多伦道的一个杂院里，几十年中，孙犁老人做得最多的事情是：读书、购书，委托友人购书，修整旧书，包书，记录读书心得。应当说，从《白洋淀纪事》到《风云初记》《铁木前传》，在革命作家群中，孙犁已经显示了他独特的叙事天赋，尤其是在《铁木前传》里，九儿、满儿，这样的女性，像未解之谜出现在孙犁的逸笔之下。如果止于此，语言自治意义上的孙犁远未完成。他非常自觉地看到，仅仅依靠

天赋，写作难以为继。所谓语言自治，当然不是指固守修辞，更不是以自我标榜来自证所谓个性，它是指在充足思想资源与充分技术准备下，写作者最终建构言语系统的能力。在书衣文录中，我看到一个困顿中谦逊的孙犁，他沿着几个路径在补课，四库全书是一个路径，鲁迅荐读是一个路径，兴趣杂项是一个路径，苏俄及法国文学是一个路径。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开始，一个经由命运磨砺、经典养育而使独立叙事能力获得新生长的孙犁出现了——他已经完成了语言自治，世界与生活，凡经他之叙述，便成为他之世界他之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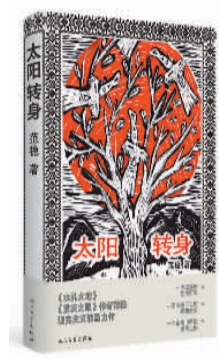
书衣文录有着强烈的日记性质，借此，我们还可以看到一个生活自治的孙犁。他是个倔强的人，奇怪的是，同时他能看见自己有些“坏”的脾气，书衣文录中人生反思的段落比比皆是，但是，他没有改变自己。有个阿姨，帮他料理生活杂务，很多年了。某日，孙犁忽然生出一个念头，是不是可以换个帮忙的阿姨。第二天，孙犁就把这个念头和阿姨说了，但一开口，孙犁就哭了，阿姨于是也哭。阿姨没有被辞退。他怎么能改变自己呢，他一生的遭际，都是为了不改变自己，不改变这赤子之心。

（作者系百花文艺出版社总编辑）

创作谈

想种一块田

范稳



2020年夏季，新冠肺炎疫情刚刚得到控制，我就去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采风。壮乡之行让我对稻作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，吃了大半生米，还不知道一株水稻是如何长成的。我只能想象：农人浸泡谷种时的期待，撒种时的仔细，育秧时的祝福，栽秧时的歌谣，薅秧时的辛劳，水稻扬花时的馨香，抽穗时的祈愿，收割时的喜悦……我知道，真正的乡村生活，还需要去发现那种探幽索微、走心入脑的现场感和质感。

一个薄热的下午，我和本地壮族作家张邦兴走过田间。田野里稻秧碧绿，刚刚过膝。我忽发奇想，想去田里走走。我们脱掉鞋子，挽起裤脚下田。田水温热可人，田泥细腻似沙，犹如绸布裹脚。我在稻田里走得偏倒偏倒，像个醉汉，生怕踩了农人的稻苗。张邦兴说中耕管理时，种田人会用脚去分辨杂草和稻秧，踩杂草做田肥，还不会损伤到秧苗。我望着眼前绿意葱茏的一片，问杂草在哪里？老张说你没种过田，看不见。

那时我想去种一块田。我要拜一个种田能手为师，“桑野就耕父，荷锄随牧童”（孟浩然《田家元日·其一》）。从驱牛下田、三犁三耙开始，再到选种育种、撒谷成秧，然后稻香来聚，收割入仓。我要履行这样一个伟大的过程，才有资格“稻花香里说丰年”。

实际上我们都在种一块属于自己的田。创作一部长篇小说，也是。当我把目光投向文山这片热土时，我预感到这里有我愿意去耕作的“一块田”。我需要去选种育苗，精耕细作，接地气，吸养分，在田里走一走，在大地上去发现。

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地处南国边陲，拱卫着国家的西南大门，40多年前这里还战云密布、英雄辈出，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才完全对外开放。它是云南贫困面积最大、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之一。脱贫攻坚打响后，边陲之地的人们义无反顾地向贫困宣战，丝毫不逊色于当年那场保卫边疆的战争。

我走访了数十个边境村寨，见证了偏远山乡的巨变，结识了许多脱贫致富带头人。他们中有的就是当年的支前模范、战斗英雄。马关县罗家坪村的村委会主任熊光斌是个身经百战的老支前、老兵。他曾在一次战斗中为了掩护战友，操作高射机枪平射了半个多小时，把自己的耳朵都震出了血。当年他在阵地上守哨卡，夜晚睡熟了就吃干辣椒，半年下来竟吃了无数干辣椒。谁能想到我们的和平岁月和这些干辣椒有关？现在熊光斌带领全村人致富，村里户户有新房，还有通畅的水泥路，有茶楼，有村民活动室。鲜花盛开在道路两旁，果实挂满了枝头，村舍掩映在树荫下，连炊烟都透着宁静安详的诗意。又有谁能想到，这里曾是边关前线？

在我们这个时代，社会在进步，观念在刷新，这种历史进程需要我们去感知，并以文学的手段真实反映。沧海桑田，早已不是古人心目中那种时光荏苒、往事越千年的时间概念。几年前还需要骑马进去的村庄，现在你开车一脚油门就到村口了；村庄里那些追逐时

尚、打扮新潮的年轻人，让人分不清他们是种田人还是城市上班族。变化实实在在，就在“转身”之间。

就“转身”带来的人物命运变迁而言，我更关注人物“转身”之前的历史。作家王安忆说过，长篇就是写人的命运。没有一个人的命运相似，也没有一个人的命运可以一言蔽之。当然，我更欣赏那些有着传奇性的、带有英雄主义色彩的人物命运。如《太阳转身》中的主人翁卓世民。我曾经采访过一个身份特殊的老警察，在在职时，他在工资单上的名字只是一个代号。他就是和平年代传奇人物，是为我们默默守护平安的无名英雄。我让卓世民这样一个有参战经历的老兵，借助于侦破一桩拐卖案，走进边远乡村，走向脱贫攻坚主战场，就像带着我的眼睛来关注这场向贫困宣战的伟大战争。一如作品中其他人物，他也要在续写人生传奇中，再次完成自己的壮丽转身。我相信有的人，就是为演绎传奇而活着，让我们这样的写作者不至于太寂寞。

进入新世纪以来，这是我的第7部长篇小说。同时也是我的一部转型之作。过去我更倾向于历史叙事，把民族文化与历史作为我的学习和表现对象。这次我把目光转向了当下、转向了壮族。当我在南国边地上行走时，我重温了火热纯朴的上世纪80年代，那时这里地正隆，我还是一个刚刚大学毕业来到云南边疆的年轻人，我们常去慰问那些从战场下来的“最可爱的人”，他们为国征战的荣耀感和自豪感让我至今难忘。这次，我重新认识了边疆、民族、国门、边境线这样一些概念，它们不仅仅是人文地理意义上的，而且会使人陡升国家认同感、民族尊严感以及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。

（作者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主席）

杨好长篇小说《男孩们》出版

本报（胡志）近日，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主办的杨好长篇小说《男孩们》新书发布会在线上举行。作家格非、北京电影学院教授梅峰、《十月》杂志副主编季亚娅及本书作者杨好围绕该书展开讨论。

《男孩们》以“母与子”为叙事核心，通过呈现男孩们的秘密过往和成长困境，折射出当代家庭、包括男孩们背后的父亲、母亲们的精神和生存状况，探讨时代和个人、代际与性别、欲望与生存之间

复杂的多样关系。格非认为，青年作家杨好通过一定的修辞手法，在虚拟与现实之间发问，展现出对生存基本意义的寻找。梅峰从电影的角度解读小说叙事，认为小说的结构布局营造了故事情节的悬念，杨好以简洁的心理描写为小说营造出清晰的画面感，叙事冷峻客观，空间感强。季亚娅认为，作者将游戏文本嵌入到小说文本中，形成现实和虚拟的互动，用游戏的形式性、虚拟性反思当下现实，独具新意。

《业余玩家》：刻画充满理想的都市青年

本报（胡志）近日，由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、单向空间联合主办的孟小书《业余玩家》新书分享会在单读视频号、十月文艺视频号同步直播。作家石一枫、班宇、文学评论家李蔚超同作者孟小书围绕新书展开讨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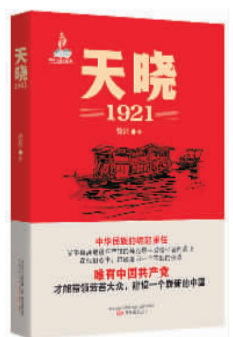
小说《业余玩家》由《请为我喝彩》《业余玩家》《凉凉北京》3个故事组成，共同塑造了一个热爱音乐、赤诚单纯、不愿妥协于命运的人物形象。石一枫注意到，小说中每一篇的主角名字都叫“孙阔阔”，作者

徐剑报告文学《天晓——1921》：生动讲述建党故事

本报（记者张鹏禹）近日，由辽宁省委宣传部主办，辽宁出版集团、万卷出版公司承办的长篇小说报告文学《天晓——1921》研讨会在北京中国现代文学馆举行，20余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。

《天晓——1921》以党的一大召开为焦点，生动还原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。与会专家认为，作者徐剑以翔实之笔和深沉之思，将中国建党建立这个空前大事予以在场式、全景式和分镜头交叉描写，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，是一部客观公允、生动好看、激情澎湃的作品。

作者徐剑曾任火箭军政治工作部文艺创作室主任，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。他以权威党史资料为依据，精心选取历史素材，扎实深入实地采访，巧妙搭建作品结构，用文采飞扬的叙述，写出了一部以文学形式叙述建党历史的长篇报告文学作品。



我和孙犁先生没有过交往，这对我来说，是个无法弥补的遗憾。但换个角度，我现在时常这么宽解自己：在精神层面我们还是相逢又相识了。并且，在这一过程中，至少近10年来，我因他保持了自己残存的想象力——我在编辑《书衣文录全编》时，感觉是非常奇妙的，我总是想象在前，然后在他的笔迹里辨认出一个似曾相识的老人，我有时能听见自己轻叹：他果然如此，他果然如此。

前不久看四川作家马平的一部长篇小说，里面的主人公也是常常听见自己在唱或者在说。世界足够安静，自己才有机会将自我对象化，才有机会反观观自身，才有机会听见自己的“思想”。书衣文录中的孙犁，是自己聆听、反观、复观自身的孙犁。

书衣文录中我们所能见到最早的段落，写于上世纪60年代，那时的孙犁才50出头。但是从那时起一直到他终止写作，他的心理年纪和他自己感受中的身体年纪，给我的印象是：老迈衰朽。他的体质应该不属于强壮型，时常患小病，但绝不至于弱不禁风。但他总是